

傅承得政治诗中的家国叙事与在地实践

郭梦琦、潘碧华*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末，马来西亚社会在“茅草行动”与华教危机的笼罩下，政治氛围高度紧绷，言论自由受到法令制约。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上，马华诗歌成为记录时代创伤与族群情绪的重要文体。此类创作中，傅承得以其强烈的地方色彩与在地意识，成为该时期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诗人。傅承得出生于槟城，国立台湾大学毕业返马，长期投身文教工作并策划“动地吟”朗诵实践，兼具诗人及出版人身份，曾获马华文学奖与国家书籍奖等荣誉。他在诗歌中常以“风雨”、“土地”、“城市”等在地意象为载体，将政治高压及历史创伤转化为诗性表达，展现其在家国之间的抉择困境与精神韧性。

关键词：马华文学，傅承得，政治抒情诗，家国叙事，在地实践

* 郭梦琦，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潘碧华，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Narratives of Homeland and Nation and Local Practice in Poh Seng Titt's Political Poetry

GUO Mengqi, FAN Pik Wa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80s, under the shadow of *Operation Lala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 crisis, Malaysian society was marked by heightened political tension, while freedom of expression was constrained by restrictive laws. In Malaysia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Malaysian Chinese poetry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genre for recording the traumas of the era an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ethnic communities. Within this literary landscape, Poh Seng Titt stands out as a representative poet of political lyricism during this period, distinguished by his profound local consciousness and strong sense of place. A Penangite and educated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h's lifelong dedication was to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work. He initiated and organised a poetry recitation movement with sizeable impact among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known as the *Dong Di Yin* (Moving Earth Chant). Assuming dual roles as both poet and publisher, Poh has received honors such as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 and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Frequently employing local imagery such as "the wind and the rain," "our land," and "our city" as expressive vehicles, Poh transforms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into poetic articulation. In doing so, he foregrounds a mode of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al poetry marked by both critical engagement and public resonance.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Poh Seng Titt, political lyric poetry, homeland, nation narrative, local practice

一、前言

傅承得（1959-），出生于槟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1984 年从台湾毕业回国后，长期投身于文教事业。曾任独中副校长、大将出版社社长，并获第 11 届马华文学奖及马来西亚国家书籍奖最佳编辑奖（华文组）等。著有：诗集《哭城传奇》（1984）、《赶在风雨之前》（1988）、《有梦如刀》（1995）、散文集《等一株树》（1987）、《我有一个梦》（1989）、《笑声如雨》（2002）、《回神》（2008）等。

傅承得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横跨数十年，涉及诗歌、散文、评论、出版事业及经典讲学，其中尤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所创作的一系列政治抒情诗最为突出，是马华新诗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通过举办“动地吟”等诗歌朗诵活动，将这些原本书写于纸页之上的政治抒情诗篇带入公共现场，使个人抒情转化为集体经验。

二、风雨将临的时代：在地的家国意象

傅承得的政治诗创作集中在 1987 年前后，这一时期正值马来西亚政治氛围高度紧绷之际。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¹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华教议题所牵动的族群焦虑，使得公共空间弥漫着一种不安与压抑的气氛。其中一个导火线乃因为委任不谙华文的行政高职到华文小学的风波与族群政治对峙情绪骤升，整个大马社会陷入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氛围中。马来西亚政府最后以《内安法令》为名的大规模拘捕了反对党领袖、华教人士、社运分子、宗教人士等 100 余人，以压制冲突升温。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傅承得大学毕业凡返马。目睹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他联合游川、小曼、方昂等人，以现代诗的写作技巧挑战现实敏感的限度（潘碧华，2008，页 191）。他以诗人的身份介入现实，创作了《哭城传奇》、《赶在风雨之前》、《有梦如刀》等作品，记录并回应这一风雨将临的时代。这些诗作之所以在马华新诗史中被反复提起，不只因为触及政治议题，更在于它把政治压迫和新闻事件，以隐喻、象征与抒情的语言，将一种介于忧患与执着的信念，呈现在诗作中。他以“风雨”为意象，把现实的政治气氛，在诗中转化为具有弥漫、笼罩的自然意象。此外，“土地”、“城市”、“暗夜”等地景意象也经常出现在诗句中，直指家国与政治的现状。

¹ “茅草行动”是马来西亚政府援引 1960 年马来西亚内安法令展开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于 1987 年 10 月 27 日展开。该行动事发后国家局势骤然紧张，常与 1969 年发生的“五一三事件”相提并论。具体事件始末可参考柯嘉逊著、杨培根译《马来西亚民权运动》第七章〈镇压与起义〉。

在傅承得的政治诗中，“风雨”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它既是对马来西亚热带气候特征的写照，更是对动荡政治局势与压抑社会氛围的隐喻。“风雨”意象的第一层意涵，是政治高压与族群冲突的即时呈现。《赶在风雨之前》一诗中写道：

“蚁虫会筑起巨穴/嘲弄我们付出的血汗/在半颓的篱笆，禽兽/会讥讽我们孱弱的骷髅/耻辱是羸弱的退缩/粉身碎骨才是无畏的拼图”。（傅承得，1988，页 13）这首诗见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马来西亚政治动荡最严峻的一幕，面对政府高压，诗人采用“隐喻、暗示、象征的表述方式渲染永不屈服的情怀。”（朱文斌，2017，页 190）

“风雨”意象的第二层意涵，是历史创伤的沉淀与延续。傅承得在〈惊魂〉中直面 1969 年“五一三事件”，叫人想起：“一九六九年/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泛滥成灾，洪水掠夺/无数一文不值的生命”。（傅承得，1988，页 37-38）诗中的“滂沱大雨”与“洪水”，是对当年种族冲突暴力场景的追忆，也是对历史创伤未被抚平的沉痛控诉。此外，在〈濠雨岁月〉里，诗人反复说“走在雨中”，并将“赤道多变的气候”比作“无常的祸福”。更尖锐的是，雨并未止于外部景象，而是进入主体内部：他的心里也有“恶魔重压着的乌云”，挥不去、拨不开，“日以继夜的停驻”，以致“睡不安寝，食不知味”。原文这样写道：

走在雨中，月如，我的心里

也有恶魔重压着的乌云

挥不去，撵不掉，拨不开

日以继夜的停驻，教人

睡不安寝，食不知味

有时必须清醒，步步为营

怕一麻木丢失了自己

有时却得糊涂，作哑装聋

怕过于绷紧，必定错乱神经（傅承得，1988，页 18-19）

与笼罩性、破坏性的“风雨”相对的，是诗中另一个坚定而沉默的“土地”意象。傅承得并不热衷使用“祖国”这一宏大词汇，他更常用的是“这片土地”、“此地的山河”之类的表述。作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傅承得在诗中始终强调华人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系，塑造“土地之子”的主体形象。在〈写给将来

的儿子》中, 他想为儿子取名“傅坦”, 因为“土, 是我们的根/旦, 太阳从平地升起/亲切温馨, 朝气蓬勃/活得踏实, 充满希望/以及胸襟开阔”(傅承得, 1988, 页 41), 将“土”与“根”直接关联, 表达了对马来西亚土地的归属感, 这里不再是祖辈漂泊的南洋, 而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城市”意象在诗歌中的地景描绘, 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在地性。在诗歌中, 城市呈现出鲜明的异化特征, 在家国叙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惊魂》中, “在这敏感的大都会/有人开枪、放火, 并且杀人”(傅承得, 1988, 页 36), 政治并未以官方命令的形式出现, 却通过流言、戒备与自我审查, 深入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诗中“漏夜猛敲杂货店的门/或击碎百货公司的玻璃窗”的场景, 还原了“茅草行动”后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的真实状态, 城市成为政治暴力的直接发生地。

傅承得笔下的“暗夜”意象与恐惧、不确定性及政治压迫相伴, 是权力阴影的象征。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笔下的“暗夜”并非全然的绝望, 而是在黑暗中暗藏着抗争的微光, 某种程度上成为族群精神韧性的见证。在《长夜未旦》中, 他写道: “你和我, 以及无数/屡屡奋进, 频频惨败/但心犹未冷血犹热的人们/为历史, 而存在”。(傅承得, 1988, 页 47) 黑暗一方面是物理意义上的夜色, 另一方面是政治高压带来的精神阴霾。然而, 即便“长夜未旦”, 仍有“心犹未冷血犹热的人们”在坚守, 这种在黑暗中不屈的姿态, 使得其诗具备抗争的内涵。

除了“风雨、土地、城市、暗夜”意象, 傅承得还将港口、雨季、热带植物等更多马来西亚在地景观纳入诗歌叙事, 进一步强化了家国叙事的在地性。如在《因为我们如此深爱》中, 诗人历数这片土地的丰饶与平静: “锡米和胶汁, 稻田和椰林/没有台风, 没有地震”(傅承得, 1988, 页 44), 这些不仅是马来西亚的经济符号, 也是华人族群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爱的对象越是具体、美好, 当它被破坏、被阴影笼罩时, 所带来的痛惜与愤懑就越是尖锐。

从意象层面回望, 就会发现傅承得构筑的是一种相当矛盾的情感结构。陈大为曾用“菁英一书斋”意识来概括《赶在风雨之前》这辑诗的姿态: 傅承得无法预设一个庞大的“广场读者群”, 也就难以形成那种革命领袖式的“群众—广场”政治诗(陈大为, 2014, 页 13)。他面对的是一小撮愿意阅读诗的菁英读者, 于是把预期效应压缩在书斋里, 选择用浪漫抒情来包裹政治立场, 将理想、忧患与殉道意愿投射到诗行之间。这种判断提醒我们: 傅承得的政治诗从一开始就带着双重自觉, 既明白现实改变有限, 又拒绝把诗退回纯粹个人情绪, 而是让文本成为华社记忆的一部分。他笔下的“风雨”, 是政治的风雨; “土地”, 是情感的政治; 而守护的漫漫“黑夜”, 则是文化承传绝不屈服的政治宣言。

正是在这些自然与地景意象的交织中，傅承得的家国叙事逐渐显影。他对这些在地意象的运用，本质上是一种抒情者的政治实践。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以边缘的在地经验，书写族群的生存抗争与身份认同”（王德威，2022，页 11），傅承得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也因此，“风雨将临”的时代并未在诗中结束。傅承得真正赶在风雨之前做的，是把风雨写成可被记录、可被辨别的形状。当一个社会开始习惯步步为营、作哑装聋，当薪火在风雨里飘摇，当城邦的安宁被摇晃，这些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治气候。而抒情者的任务，正是用自然与地景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在地家国的证词。

三、家国之间的抉择：抒情主体的情感政治及处境

傅承得的政治诗没有将诗人塑造成坚定不移的道德象征，相反，他反复呈现的是一种被撕扯、被拖拽的状态。家庭责任、族群处境、政治现实与个人理想彼此纠缠，使“抉择”本身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心理与伦理负担。正是在这种负担中，傅承得的政治抒情显示出独特的情感政治结构。正如钟怡雯所说，这系列抒情诗的基调是浪漫的，但带着强烈的现实感（钟怡雯，2008，页 206）。

马华文学始终萦绕着“离散”（Diaspora）的母题。对于更早的南来作家，离散是关于“原乡”与“故乡”的双乡之痛。而对于傅承得这一代在独立后成长的土生世代，“离散”更多是一种潜在的、精神性的可能选项，即面对困境时，“离开”的诱惑与想象。在《有梦如刀》的部分诗作，或《赶在风雨之前》的某些忧郁时刻，一种疲惫与疏离感会悄然浮现。例如〈迷路〉中对于城市道路的陌生感与“重检记忆的图腾”的渴望，便隐含了某种精神流亡的意味。

在政治高压时期，离开马来西亚成为许多华裔家庭的讨论话题，尤其在华文独立中学教育权利反复被挑战的年代，许多人认为下一代应往外走。但傅承得诗歌中的“离开”想象，却是对文化根源的精神回望。本土文化及其本土生活，是华族文化的“本土之根”。（王列耀，2005，页 227）他负笈台湾留学，抱持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追寻，如《哭城传奇》中〈哀江南〉诗名即取自庾信《哀江南赋》，试图把祖先的流离记忆与自身离家的际遇结合在一起（洪淑苓，2015，页 41）。“留下”的抉择彰显了抒情主体的在地化认同与责任担当。如〈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开篇即点明他作为诗人的使命：

月如，我会用我的一生

和着泪，经历与悼念历史

忧伤，会盘踞每一管血脉

但并非绝望, 我知道

因为别人的呻吟中, 我在

别人的愤恚里, 我也在 (傅承得, 1988, 页 4)

马来西亚在“五一三”之后, 1971 年起颁布的“以马来土著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文化政策, 长期以来构建了不平等的族群结构, 华人文化处于边缘状态。傅承得直面这一政治现实, 通过对华社处境的具象化书写, 展现了抒情主体在国家结构与族群利益之间的拉扯与抗争。这种书写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又蕴含着对族群和谐的深切期盼。

在《有梦如刀》的〈马来西亚注〉一节中, 诗人对国家历史进行沉思: “历史在刀尖思量/昼夜在海岸冥想/黑暗的土地/黄金之邦/我开始茫然”。然而, 诗末笔锋一转: “我开始豁朗/刀尖能划破黑暗/海岸能镀染金黄/信心长在, 爱心不亡/马来西亚, 我永恒的河山”。(傅承得, 1995, 页 39) 从“茫然”到“豁朗”的转变, 正是诗人从游离想象到扎根抉择的精神轨迹。他也清醒地意识到, 在种族政治的游戏里, 华族的身份与生命可能被贬值为市场逻辑下的商品, 〈长夜未旦〉直言道: “我们不是下贱的民族啊/为什么在别人眼里, 月如/市场总值比实际价格还低/甚至可以丢弃或任意抛售”。(傅承得, 1988, 页 49-50) 这种认知带来的不仅是愤怒, 更是一种深切的、近乎窒息的拉扯感。抒情主体被两种力量撕扯, 一边是对这片土地与文化无法割舍的深爱, 另一边是对施于己身的不公与压抑无法释怀的痛惜。再如〈旗与竿〉中“遇雨, 就破烂吗/临风, 就颤抖吗/这些旗与竿/紧紧系住/五百万个希望/身为旗与竿/便得神采飞扬/挺直骨干/绝不忍辱孱弱/任风雨侵犯”(傅承得, 1995, 页 35), 用“旗与竿”象征华社的族群标识与抗争精神, 而“挺直骨干”则彰显了族群的抗争决心。

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在于他将政治批判与情感伦理深度融合, 呈现出“爱”“责”“愧”“怒”的多重情感表达。他对国家的爱、对族群的责、对历史的愧、对不公的怒, 这些情感相互交织, 形成多声部的内心独白。

“爱”是抒情主体情感政治的核心底色, 这种爱兼具对土地的眷恋与对族群的深情。《夜读〈老舍之死〉》展现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傅承得, 1995, 页 18) 借老舍之悲剧, 诗人抒发马来西亚华人的相似处境, 爱国却未必被国所爱, 且忧虑自身处境的危机。这种情感在〈灵魂的告白〉中进一步深化, “人死后/世间一切, 都看淡了/只有两样东西/坠于心/并且愈来愈沉/一个叫/国/一个叫/家”。(傅承得, 1995, 页 19) 国与家的分量在死后反而“愈来愈沉”, 暗示在生时已成为无法卸下的重负, 死后亦然。再如《告诉我, 马

来西亚》交织着爱、怨与期盼：“该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节奏和音量/才能歌颂你/辽阔无比的胸膛”。（傅承得，1995，页 20）诗人既想歌颂国家，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语境，某种程度上隐喻着华人在国家叙事中的失语和无奈的状态。

“责”与“愧”的情感交织，则彰显了身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作为知识分子，诗人深知自己肩负着文化传承与族群代言的使命，而现实的压迫又让其产生力不从心的愧疚。但在诗人笔下，这种愧疚没有变为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升华为责任与担当。〈抱负〉一节这样谈到：“要就长成青竹/用拔地而起的气势/可以穿云，可以摩天/可以破空横贯/风雨敬畏”。（傅承得，1995，页 24）此节开头点明是写给他的学生，体现了马华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展现了师者的教育理念与传承民族使命的意识。

此外，“怒”的情感构成了政治批判的直接动力，其批判对象既包括外部的族群压迫，也包括内部的族群惰性。如〈愤怒代笔〉一节便以反讽的笔触，批判政党内的斗争中政治人物的投机取巧与民主的虚伪。

色彩斑斓的旗帜下

炮火轰隆的山头

机会大把大把走来

林派、李派，都有益身心

必要时，我赞美党团结

如今，当然歌颂党分裂

后者是民主的石基

民主，是我最爱的云梯（傅承得，1995，页 60）

这四种核心情感，爱、责、愧、怒，它们相互缠绕、相互激发、相互辩证。因爱而生责，因责重而觉愧，因愧与不公而燃怒，而最终的怒又反向证明了爱的深切与责的执着。可见，傅承得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呈现出一个在家族与族群、离去与坚守、个体与集体、挚爱与愤懑之间不断抉择、持续撕扯，最终选择负重前行的知识分子形象。

四、敢有歌吟动地哀：从文字到舞台的朗诵实践

1988 年, 傅承得与游川、温任平、方昂等马华诗人共同发起“动地吟”现代诗巡回朗诵会(刘艺婉、傅承得, 2009, 页 38), 并担任主朗诗人, 足迹遍布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社区、学校与文化场所。“动地吟”三字取自鲁迅的《无题》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其演出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第一阶段 1988 年至 1990 年的演出, 从 1988 年“声音的演出——游川、傅承得现代诗朗诵发表会”(1 场)、1989 年正式以“动地吟”之名展开的现代诗巡回朗诵会(6 场), 到 1990 年“肝胆行——90 年现代诗曲朗唱会”(5 场)的演出; 第二阶段则是 1999 年“99 动地吟”的演出(22 场), 出席的观众达两万人; 第三阶段则是 2008 年“动地吟纪念游川——诗曲朗唱舞蹈演出”, 为纪念 2007 年去世的游川而展开的演出(曾维龙, 2012, 页 52)。

演出的诗人都有一个共识, 认为文学应该具有反映和批判社会的功能。除此之外, 文学作品应扎根于现实生活, 可以朗诵、吟唱, 如此才能释放诗的形式(叶福炎, 2022, 页 388)。同样地, 傅承得的诗歌创作不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 更通过“动地吟”这一独特的文化实践, 实现了从私人书斋向公共舞台的跨越。傅承得在《赶在风雨之前》自序中表示, 他写下这些诗, 是为了把这一段不安气氛的年代交付未来。后来许多投身写作、出版或社会运动的人, 都在访谈中回忆第一次观看“动地吟”的震撼, 那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诗可以这样说政治”, 而对创作有了确定的方向。

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脉络来看, “动地吟”这一诗歌运动延续了马华文学以文抗争政治的倾向。早期马华文学多聚焦于乡愁书写或个人抒情, 而“动地吟”将诗歌与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紧密结合, 通过巡回演出的形式, 打破了地域、阶层的界限, 使文学从精英圈层走向大众。朗诵会所到之处, 既有城市知识分子参与, 也有乡村华人围观; 既有年轻人的激情响应, 也有老一辈的情感共鸣。这种广泛的参与性, 使“动地吟”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传播, 成为凝聚族群意识、传递抗争精神的民间文化运动。与前辈作家的写实主义文学相比, “动地吟”更强调现场性与互动性, 通过情感交流以及集体动员, 推动马华文学的抗争性从文本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

朗诵自古以来是中国诗歌活动的常态, 但不是马华现代诗的传统(张锦忠, 2018, 页 157)。与传统文学沙龙的小众模式不同, “动地吟”刻意拉近与民间组织的距离, 主办与协办单位包括独中、华团、乡会、文化团体等, 舞台多设在礼堂、社团、广场、商场中庭甚至交通工具上。且常与音乐结合, 吉他、口琴、笛子等乐器的伴奏烘托气氛的同时, 更赋予诗歌新的情感维度。

作为中文系毕业生，傅承得兼具古典文学素养与现代口语表达能力，其朗诵风格既注重文字的韵律感，又强调情感的表现。对于《有梦如刀》中饱含乡愁与悲情的诗作，他放缓语速，降低语调，以沉郁的声音传递族群的历史创伤。这种朗诵技巧，使文字的情感内涵得到精准传递，让观众在听觉体验中感悟深刻。以其初期时的抒情诗〈问候马来西亚〉为例，句式反复吟咏，浪漫式抒情。无怪乎曾维龙言：“这类诗的格式，更适于表演，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曾维龙，2018，页 141）

早安，马来西亚

朝阳仍自由照耀吗

清风仍自由吹拂吗

晨鸟仍自由欢唱吗

如果是的

早安，我的国家

晚安，马来西亚

天空让云朵自由遨游吗

大地让花木自由成长吗

海洋让河川自由流入吗

如果是的

晚安，我的国家（傅承得，1995，页 33）

他的政治诗通过朗诵实践，将族群的核心关切转化为公共议题。傅承得在“动地吟”中朗诵的诗作，始终围绕马华社会的核心公共议题展开，包括华文教育的困境、种族政策的不公、民主自由的缺失、历史创伤的记忆等。〈给华人政党〉中“所有的角色/还戴面具/厚重的落幕/回归黑暗”（傅承得，1995，页 31），直接批判华人政党在族群抗争中的懦弱与妥协，引发观众对华人政治参与方式的讨论；〈华教人物画〉中“世间万物独蟹善横行/天虽好生/而未免多事”（傅承得，

1995, 页 95), 讽刺华教团体中的投机者, 刺激观众去反思华教传承的真正危机。又如〈浴火的前身〉一节, 层层堆叠的“火烧阿房宫”、“碧竹直插云霄”、“红锈的嘲笑”等意象, 阅读时可能感到略显繁复, 但在舞台上, 朗诵者往往选择其中几段, 以节奏推进意象转换。先以低沉声线缓慢描摹惊人烈焰, 再在“照清德治暴政的面目”一句突然提速、加重, 让观众感到一种从远景逼近到面前的压迫感。他的诗歌中不乏政治上敏感的题材, 可谓当时诗界活动的一项突破(陈湘琳, 2023, 页 81)。诸如此类的诗作, 通过朗诵的形式, 将原本隐蔽的族群焦虑与不满公开化, 使华文教育、种族平等、民主自由等议题成为华人社区的公共讨论焦点。

透过一连串的演出, 傅承得和游川等人成功串联本土诗人, 架设平台, 让社会重新关注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发展。巡回朗诵也让傅承得以诗人的身份站在舞台中央, 从书斋知识分子转型为族群发声者。朗诵会结束后, 许多观众自发参与到华文教育的推广、族群权益争取的活动中, 诗歌中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行动。

五、结语

追求华社文化根脉的坚守与在地身份的认同, 是傅承得政治诗的核心主题。傅承得是马华文学中极具辨识度的一位诗人, 他以十三年华教实践、“动地吟”公共朗诵与文化出版深耕, 将个人生命轨迹融入族群命运。其诗集《哭城传奇》、《赶在风雨之前》、《有梦如刀》的创作脉络, 恰是他作为“在地守护者”的精神写照, 既饱含对本土的深情, 又凝结着华教深耕与族群抗争的实践体悟。他的实践表明, 在地自我的建构, 亟需在文化行动中开辟表达的可能。也正因此, 他政治诗中的家国, 并不是抽象的“国家”, 而是他所亲历、亲自参与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国土。在他的创作与实践中, 彰显出一种“以诗为剑、以教为根”的在地坚守精神, 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树立了兼具文学锐度与社会担当的作家典范。

参考书目

- 陈大为(2014)。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2-18。
- 陈湘琳(2023)。文本及文本以外的阅读——论马华作家傅承得的散文。《华文文学》, (3), 81。
- 傅承得(1995)。《有梦如刀》。马来西亚千秋事业社。
- 傅承得(1988)《赶在风雨之前》。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
- 洪淑苓(2015)。留学台湾·寻找“中国”——论马华诗人傅承得与陈大为作品中的“中国图像”与台湾经验。《台湾文学学报》, (27), 41。
- 潘碧华(2008)。参与的记忆: 建国中的马华文学。《中华文化与文论》, (2), 191。

- 王德威（2022）。想像的“非”共同体。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主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页 11）。时报出版社。
- 王列耀（2005）。《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叶福炎（2022）。抒情与呐喊：游川与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载于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主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页 388）。时报出版社。
- 曾维龙（2012）。论“动地吟”诗歌运动——一场马华文学起义运动和现实主义短诗创作。《华文文学》，（6），52。
- 曾维龙（2018）。马来西亚“后茅草行动”的华社变迁：以“动地吟”诗人群体为个案讨论。《文化研究》，（27），141。
- 张锦忠（2018）。在万家墨面的时代：“动地吟”的文学行动。《文化研究》，（27），157。
- 钟怡雯（2008）。遮蔽的抒情——论马华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淡江中文学报》，（19），206。
- 朱文斌（2017）。《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